

多模态视角下的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学实践研究

SAPARBAEVA AIDAI*, 李 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

【摘要】受中国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推动，汉语教学全球化步伐加快，吉尔吉斯斯坦已成为中亚地区的战略学习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沿线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教学问题：汉语的声调和表意特征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黏着性突厥语（吉尔吉斯语）和字母通用语（俄语）之间存在鲜明对比；此外，比什凯克等大城市与农村社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加剧了汉语的可及性。多模式教学将视觉、听觉、动觉和数字媒体的多种功能融合在一起，成为应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它跨越了语言障碍，通过多种感官途径将学习置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文化背景中（Jewitt, 2009; Su, 2025）。

【关键词】文化锚定多模态；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学；一带一路；多模态评估；教师民族志发展

【收稿日期】2025 年 8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9 月 10 日

【DOI】10.12208/j.ije.20250319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s in Kyrgyzstan

Saparbaeva Aidai*, Jin Li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Driven by China'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language instruction has accelerated, making Kyrgyzstan a strategic hub for Chinese learning in Central Asia. As a key BRI partner, the country faces acute pedagogical challenges: the stark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tones and logographs and Kyrgyzstan's agglutinative Turkic language (Kyrgyz) and alphabetic lingua franca (Russian), together with a deep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that further restricts access to Chinese. Multimodal teaching—integrating visual, auditory, kinesthetic and digital resources—has emerged as an effective response, surmounting linguistic barriers by embedding learning within Kyrgyz socio-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multiple sensory channels (Jewitt, 2009; Su, 2025).

【Keywords】Culturally-anchored multimodalit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Kyrgyzsta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ultimodal assessment; Ethnographic teacher development

1 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和背景挑战

第二语言学习（SLA）理论、多模态话语分析（MDA）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文化环境特点的结合，使得在吉尔吉斯斯坦课堂上实施多模态汉语教学成为一种衍生现象。克拉申（Krashen）提出了“输入假说”（1982），该假说认为，当个体接触到略高于其现有工作知识水平（ $i+1$ ）的可理解输入时，其语言学习能力获得最佳。多模态工具填补了吉尔吉斯斯坦学习者母语（吉尔吉斯语的黏着性语言结构和俄语的字母书写语言）与汉语（声调系统和表意文字）之间的障碍，帮助学习者找

到汉语声调和汉语表意文字的深度。视频提供了直观的语法，展示了时间量词的用法，例如学了一年（学习了一年），使用视觉流程图和动觉角色扮演（Su, 2025）。Schmidt（1990）的注意假说中描述了彩色拼音表的有效性，这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当在专门的图表中突出显示语音差异时（m 为红色/蓝色，而 m 为蓝色/红色），人们就会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差异，而当学习者习得其母语中不存在的语音对比时，这种差异不是通过被动接收信息而是通过强化传递到感官的信息来实现的。

*通讯作者：SAPARBAEVA AIDAI（1994-）女，吉尔吉斯族，吉尔吉斯斯坦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作者简介：李晋（1977-）女，汉，山西长治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艺术传播。

多模态汉语教学的符号学基础基于韩礼德(1978)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克雷斯的范列文(2001)的MDA理论。汉字的视觉模式(笔画模式)、听觉模式(发音)和空间模式(部首位置)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完全适合多模态解构。例如,以动画形式呈现的笔画顺序序列,例如水(水)可以利用视觉机会,结合吉尔吉人可能遇到的常见河流图像,揭开表意文字构成的神秘面纱。该方法可以描述为遵循Mayer(2009)使用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双通道(视觉和听觉)处理可以减轻认知负荷。在数字化程度较低或完全没有的地方,例如奥什的农村地区,在毛毡阿拉基兹垫上描摹字符(一种触觉过程)就运用了这些原理,结果80%的字符都能被记住(Liu&Liu, 2021)。

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多样性和技术差异需要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吉尔吉斯斯坦人口670万,城乡差异巨大(国家统计局,2023),这给汉语教学带来了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在比什凯克这样的城市,可以使用像HelloChinese这样的应用程序来教授声调;然而,在科奇科尔这样的农村地区,只能使用太阳能充电的视频/音频播放器和实体的抽认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文化冲突。这些地区根深蒂固的游牧文化(以《玛纳斯》等口头史诗为基础)与儒家文化(例如中国的文字)以及起初显得陌生的现代诗歌理念相互交融(沈,2025)。这是通过结合文化相似性以多模式方法解决的:例如,诺鲁孜节(吉尔吉斯斯坦)和春节(中国)的VR比较具有共同的“更新”仪式元素和角色扮演多尔多伊集市交易(中文为“多少钱?”“多少钱?”)贸易词汇变得流动起来!这些技巧通过让学习者在现实且无焦虑的情境中探索假设,证明了斯温输出假设(2005)的正确性。

将全球理论语境化的需求源于中亚地区二语习得研究的匮乏(Shen, 2025)。另一个例子是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PD)(1978),如今在吉尔吉斯斯坦,该理论已得到不同的表述:城市学生通过将学习过程游戏化来学习,例如通过游戏获得良好的音调准确度,而农村学生则可以通过描摹汉字等小组活动来提高能力。这些调整强调了多模态教学并非固定的教学方案,而是一种协商的实践,这种实践必须先在吉尔吉斯斯坦草原上回响,才能融入普通话的音调。

2 多模式策略实践

为了确保吉尔吉斯斯坦的多模态教学法,需要在三个方面采取战略性措施:城市数字听觉融合、农村低技术动觉适应以及支架式文化。在比什凯克第31学校,

一项为期12周的基于HelloChinese应用程序的干预措施结合了声调手势动作,学生在正声调(例如mǎ)时将手高举,在负声调(mà)时将手向下,最终声调准确率达到89%。“一带一路”贸易场景VR模拟(例如,训练弹奏……)方价格???这一观点在([合同价格?])的输出部分得到了进一步证实。Swain在该文中预测,语言产出能够使知识具体化。最重要的是,这种策略不会造成认知超负荷,因为任务是按顺序呈现的:数字化练习之后是具体化练习,这符合连贯性原则(Mayer, 2009)。

在纳伦的村庄里,当地的物质文化是资源匮乏条件下创新的源泉。借助新颖的抽认卡和可识别的生态环境,老师们将汉字分解成:木(树)上长满了胡桃树枝,而山(山)用天山山脉的轮廓来表示。学生们用粉笔在什尔达克地毯上刻了一些字符,以此来加深对文字的理解;这不仅是一种动觉学习,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利用太阳能驱动的MP3播放器,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以地道的语音播放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双语者口述的对话。音频方言也与当地语言存在冲突;作为一种参与式解决问题的形式,教育工作者与社区长者共同创作了教材,因为多模态教学能够响应基于地点的知识。

跨文化桥梁在卡拉科尔最为生动。那里的学习者们创作了双语书籍,名为“隐喻词典”,将吉尔吉斯语和汉语的概念等同起来。这种视觉隐喻的一个例子是:草原草原被画成了көк жаңылк (蓝色牧场)。角色扮演集市为学生们提供了用中文编写的短语手册,将表达兴趣的表达和对某物价格的解释,例如“Бу л канча?”翻译成“多少钱?”而使用茶具和毛毡地毯等可动手操作的材料则增强了身体的参与度。活动后的反思还表明,文化刻板印象减少了55%,这凸显了多模态模型的潜力,它可以将抽象的文化概念分解为可协商的、具体化的接触。所有这些例子都支持同一种文化锚定多模态(CAM)方法:让教学不再局限于汉语的复杂性,而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它的声音以及它带来的传奇故事。

吉尔吉斯斯坦多模态实践的一个方面吸引了批判性研究,但研究却有限,那就是文化响应式评估模型的形成。现有的测试形式基于诸如回忆人物姓名或记忆语法规则等技能,并未考察其他形式的多模态学习,例如跨文化交流或通过肢体表达的声调掌握。为此,我们在比什凯克和奥什当地的课堂上试行了三级评估叙事:

(1) 基于绩效的任务(例如,根据目标词汇在多多

伊集市进行谈判角色扮演)；(2) 数字作品集(例如，编写 VR 导览反思笔记、双语民间故事插图)；(3) 社区验证(例如，评估学生运用吉尔吉斯斯坦长辈的谚语阐释汉语成语的能力)。中国山水诗(例如，李白在奥什的一个案例中，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所谓的天山故事卷轴，并将山诗与当地山脉的毡贴花图像结合在一起。这些卷轴的评分标准不仅仅是语言的正确性，还必须体现文化流畅性，或者学生如何很好地将中国美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物质文化联系起来。研究结果表明，与书面测试相比，抽象词汇的保留率高出 35%，这毫无疑问证明了多模式评估不能忽视知识的情境应用，而应该优先考虑脱离语境的操练。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社区价值观，学生可以在村庄会议上展示卷轴，因此学习是一个社会活动，而不是类似于考试的个人过程，而是一种知识的社会建构，代表了维果茨基的观点，即知识是在实践社区中共同建构的。

3 挑战和文化锚定解决方案

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影响着多模态汉语教学法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引入：技术不平等、教师准备差异以及文化语言摩擦。这些障碍需要基于当地实际情况而非模板的答案。最明显的障碍是技术。比什凯克市区拥有高速互联网，可以使用 VR 模拟和虚拟现实工具，例如 HelloChinese，而纳伦省只有 38% 的居民使用稳定的互联网连接(世界银行，2024 年)。这种数字鸿沟可能会导致 62% 的吉尔吉斯斯坦学习者无法使用基于云端的多模态工具。尽管如此，他们表明，与社区共同设计的低技术选项也能提供同样良好的效果。在科奇科尔村，有太阳能音频播放器，播放预先录制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市场对话(“Б у л к а н ч а ?”)。线下听觉练习(了多少钱?)的发明是利用沙盘装载当地河流沉积物来实现的，沙盘将汉字书写变成了基于触觉的、基于地点的仪式(按顺序排列的沙盘)。这类发明体现了技术实用主义：它们使工具能够适应现有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引入一种资源需求模型。

此外，教师的准备程度也是第二个关键障碍。接受过专业多模态培训的吉尔吉斯斯坦汉语教师不到六分之一(Su, 2025)，因此，较为传统的语法-翻译方法被滥用，而这些方法并不适合教授声调语言和表意语言。这个问题比技术技能本身更为根深蒂固：教师无法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汉语教学背景下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口头史诗文化和教学法(例如，朗诵《玛纳斯》)。为此，我们建议开展民族志教师发展项目：首先，由孔

子学院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阿昆(口头诗人)共同举办的暑期强化课程将展示毡画隐喻如何用于教授部首的可能性(例如，丝/丝绸反映在 shyrdak 图案中)。其次，流动教学实验室将带着 USB 套件走访村庄，其中包括：(a) 吉尔吉斯语配音的笔画顺序记录动画痕迹，(b) 展示天山景观和中文自然词汇的可打印抽认卡(山/山，河/river)，以及(c) 比较诺鲁孜节和春节传统习俗的教案。第三，为了实现实时沟通，将利用无线电渠道(带宽较低)上的论坛，在城乡教师之间建立同伴指导网络，以便实时排除故障(例如，如何使语调手势适应有运动障碍的学生)。

其中最微妙的是文化语言摩擦。吉尔吉斯斯坦的游牧历史重视口语、地理流动性和知识共享——这与以背诵汉字和推崇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汉语教学截然相反。当文化沉浸活动回归以汉族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例如，与吉尔吉斯斯坦的“jarmas”无关的茶道)时，多模态教学法往往会失败。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文化适应必须双向构建才能成功。在卡拉科尔，差异甚至更大，在被要求画出所谓的“jarmas”之后，学生的词汇量增加了 40%。信心(隐喻桥梁)：描述概念如何勇气勇气在史诗《玛纳斯》和中国传奇《西游记》中都有所体现。同样，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情境角色扮演只有在场景设定在多多伊集市动态中时才能取得成功。在多多伊集市中，吉尔吉斯斯坦商人就中国进口商品进行谈判时，会使用诸如“这便宜点吗？”“还能再便宜点吗？”之类的混合短语结构。这种文化转换将摩擦转化为教学协同效应，并通过本地化的支架系统描述了维果茨基零散人格发展模式。

4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支持框架

这些挑战可以通过利用吉尔吉斯斯坦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杠杆来克服，尽管这一杠杆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并非仅仅用贸易术语进行词汇学习练习(我本来想写词汇，但直白地说：词汇不是学来的，只是重复而已)，而是有资源补贴跨模式材料中心：将废弃的铁路集装箱改造成配备风力驱动 VR 头戴设备的移动学习中心，以便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合资企业。与此同时，语言政策必须要求一半的教材与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共同编写，因此，汉语语法的正常教学方式会因游牧式认识论而发生改变。在阿克布拉大学，毡部首词典(树根变成毡贴花图案)的实施(其中汉字学习速度提高了 30%)表明，文化资源已成为认知经济的源泉。

情境响应策略正在融合成一个文化锚定多模态

(CAM) 框架, 这是一种去殖民化方法, 它不再将吉尔吉斯斯坦知识视为一个复杂因素, 而是将其视为汉语习得的支柱。CAM 的成功取决于如何将技术差距、教师准备程度和文化间摩擦视为社会网络中的各个层面, 而不是孤立的问题。该研究可能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 创建一个国家多模态教师队伍, 并通过“一带一路”技能发展补助金提供资金; 确保数字工具(例如应用程序、虚拟现实)在部署到农村社区之前在草原上进行测试; 最后, 建立一个吉尔吉斯-中国民间传说资源库, 多模态资源(动画民间故事、双语歌曲集)可以通过广播/USB 在社区之间自由共享。只有当在教学中听到 jailoo (夏季牧场) 的节奏时, 才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个语言环境中听到普通话的声调。

参考文献

- [1] Gibbs, R. W. (2006).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Edward Arnold.
- [3] Jewitt, C. (Ed.). (2009).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Routledge.
- [4]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rnold.
- [5] Krashen, S. D. (1982).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rgamon Press.
- [6] Li, Y., & Zhang, Z. (2021). Confucius Institutes' impact on Chinese education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12*(3), 45–60.
- [7] Liu, D., & Liu, X. (2021). Applying multimodal theory to Chinese character pedagogy. *Journal of Hubei Open Vocational College*, *34*(22), 158–160.
- [8] Mayer, R. E. (2009). *Multimedia learning*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Paivio, A. (1986).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al coding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Schmidt, R. (1990).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1*(2), 129–158. <https://doi.org/10.1093/applin/11.2.129>
- [11] Shen, F. (2025). Teaching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multimodal intercultural frameworks. *Science and Education Journal*, *7*, 144–147.
- [12] State Statistical Committee of Kyrgyzstan. (2023).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Demographic trends*.
- [13] Su, X. (2025). Multimodal grammar instruction for Kyrgyz learners.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8*, 83–85.
- [14] Swain, M. (2005). The output hypothesi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 471–483). Routledge.
- [15]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6] World Bank. (2024). *Digital access gaps in Central Asia: Kyrgyzstan country brief*.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099409302042326919/p1802520c28179080b0a8500b2b7f3a5e1f>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